

全书主编 张国祚

中华 骄子

艺术名流

● 主编 邓福星 王安葵

● 龍門書局



中華驕子
藝術名流

主編 鄧福星 王安葵

龍門書局

1995

(京) 新登字 306 号

DP 26/25

内 容 简 介

中国的书画，中国的曲艺，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人类的艺术瑰宝。那么，这些艺术瑰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是怎样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又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呢？王羲之的草书、王实甫的《西厢记》、徐悲鸿的奔马、梅兰芳的京戏，无不脍炙人口，令人倾倒。

本卷描写了 38 位艺术大师的艺术追求和道路，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成功秘诀，可读性极强。本卷可作为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材，也可供广大读者阅读、收藏。

中 华 骄 子

艺 术 名 流

主编 邓福星 王安葵

责任编辑 杨 岭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17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5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7

印数：5501—16000 字数：180 000

ISBN 7-80111-029-3/Z · 25

定价：6.80 元

《中华骄子》编委会

主 编 张国祚

副主编 周溯源 王渝生 萧少秋

名誉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振海	邓广铭	王 淇	王梓坤
冰 心	陈久金	张作耀	张岱年
张 健	张海涛	张静如	李希凡
李景瑞	侯树栋	郭传杰	席泽宗
陶德麟	龚书铎	黄楠森	董芳明
臧克家	戴 逸	魏 巍	

编 委

张国祚	周溯源	王渝生	萧少秋
杨 岭	何伟华	陈雨春	刘重日
瞿林东	张海鹏	戴文忠	夏春平
刘继贤	杨胜群	李 蓉	徐安德
赵 军	黄华昌	黄振春	温仲玉
张瑞山	马宝珠	廖育群	杨志超
周桂钿	董书城	王利娟	

数千古入杰伟业 开万代风流新篇

——《中华骄子》总序

张 国 祚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团结和激励炎黄儿女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上下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孕育出灿若繁星般的各类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昌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优秀人物就是值得炎黄儿女引为自豪的“中华骄子”。挖掘和整理自古以来“中华骄子”的辉煌业绩，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展示“中华骄子”的风采，树立中华民族的高大形象，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为研究、评价和宣传优秀历史人物开辟一条新思路，建构一个新体系，这就是编撰《中华骄子》的宗旨。

在建构新体系时，首先面临三个不可避免且比较艰难的问题：其一，如何设立书目；其二，如何界定“骄子”；其三，如何给“骄子”分类归卷。针对这三个问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我们确定了三条总的原则。

一曰：需实兼备。“需”即需要。古为今用，是我们研究历史时应该提倡的一个目的。以史为鉴，从优秀历史人物中为今人遴选出值得赞赏和学习的楷模，这是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本书编撰的需要。“实”即实际。以客观实际为据，坚持实事求是。有哪方面的骄子，设哪方面书目，所写骄子，必须有客观原型和翔实资料。所谓“需实兼备”，即力求做到思想

与客观性统一，文学性与史学性统一，趣味性与科学性统一，可读性与学术性统一。

二曰：白璧允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便杰出人物也难免存在缺点和失误，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因微瑕而掩玉美，更不要因微瑕而否玉美。对于骄子，既要突出其所以成为骄子的感人业绩，又要评价得恰如其分。有鉴于此，凡选入本书的骄子，或取其主流，或取其大节，或取其晚节；对其历史贡献和正面影响，渲以浓墨。对其“瑕”，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下，亦适当点到，以作后人鉴。

三曰：角色取优。社会历史是个复杂的大系统，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受到各种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其社会实践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骄子也不例外。骄子哪方面堪称为骄子，就取其哪方面角色选入本书。若其多方面角色均堪称为骄子，则取其最重要、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角色选入本书相应的卷。

遵循上述三条总的原则，并考虑到兼顾历史与现实，我们从数以万计有文献可考的中华古今人物中遴选出近千位骄子，共分26卷。书目如下：《革命伟人》、《民族英雄》、《农民领袖》、《辛亥烈士》、《红色英灵》、《思想先哲》、《改革先驱》、《卓越使者》、《军事奇才》、《治世能臣》、《廉洁楷模》、《侠义勇士》、《著名帝王》、《天文泰斗》、《数学太师》、《农神水伯》、《医圣药王》、《奇工巨匠》、《史学巨擘》、《文学名家》、《艺术名流》、《实业元勋》、《体坛明星》、《港台名人》、《海外华杰》、《归国英才》。这26卷构成了《中华骄子》体系的整体框架。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放眼全球，环顾今日，正是中华民族骄子辈出的伟大时代。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各种领域，都活跃着我们民族引为自豪的骄子。但是，由于资料不全，条件有限，除《革命伟人》、《侠义勇士》、《体坛明星》、《港台名人》、《海外华杰》和《归国英才》等六卷之外，本书只收入了已故的“骄子”。在资料齐备，条件成熟时，我们考虑出版上述26卷的续

编，增设《劳动英模》、《民主仁人》、《千秋功臣》等新卷。

纵览《中华骄子》各卷，所载杰出人物，才思神勇，千姿百态，读者可从中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民族具有热爱祖国的高贵品格，能智能勇的卓越才能，顶天立地的伟岸丰姿，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文化，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万劫不灭的勃勃生机。读者可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登临长城而望“城”兴叹？为什么国际竞争对手面对重新崛起的中华而惊呼“醒狮”？为什么某些预言家大谈“21世纪将是华人称雄天下的世纪”？愿本书能使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伴随往昔杰出人物震撼人心的足音旋律，争做无愧历史重托的时代风流，不断为《中华骄子》增添新的篇章。

本书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大型人物图书，其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之广，系统分类之全、遴选标准之高、分类归卷之难、撰写要求之严，在同类书籍中实属仅见。许多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深孚众望的老专家、老学者给予本书以热心的关注和支持；许多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勇于开拓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如果没有史学界、哲学界、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军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众多专家学者卓有成效的密切合作，完成这样一部巨著是难以想象的。特别应该指出，龙门书局在复出伊始、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便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而郑重推出26卷本的《中华骄子》，可见方向明、气魄大，功不可没。

由于撰写时间短、任务重，本书在体系结构、遴选取舍、史料考证、评价分寸、写作风格等方面，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1994年8月于北京

卷 首 语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百花园中，书法、绘画、雕塑、戏剧、曲艺、音乐等形式，异彩纷呈，名家辈出，拥有众多的传世之作。中国书画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彩陶纹饰。在那些人面或动物的纹样、旋纹和波纹中，在那些用刷笔涂抹的点点划划中，业已蕴含了中国书画观念的萌芽和书画样式的雏形。历代书画家的作品，开创和展示了中华民族各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和时代精神，发展下来，中国书画已成为炉火纯青的民族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历代书画大家都具有丰富的学识和高深的修养，其人品如作品一样，值得后人敬仰。中国的戏剧曲艺同样历史久远，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杰作迭出，名家瞩目。如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为世代人民所喜爱。到了近现代，在中华民族挨打受辱、人民遭受苦难的情况下，许多戏剧曲艺家如田汉、欧阳予倩等，把自己从事的戏曲事业与爱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作品打击敌人、团结人民，为民族解放、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而斗争。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杰出成就，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目 录

书圣王羲之	1
“虎头三绝”顾恺之	6
“画龙点睛”张僧繇	11
画圣吴道子	15
刚正坚贞的大书法家颜真卿	21
草书狂僧怀素	27
绘画与理论兼长的荆浩	32
为国忧患一生的画家李唐	37
“刷字”书家米芾	43
皇帝画家赵佶	48
书画奇才赵孟頫	53
“不求形似”的孤傲画家倪瓒	57
吴门画派领袖沈周	63
翰墨“巨眼人”——董其昌	69
耿介狂怪的八大山人	76
清正奇崛的郑板桥	81
中国 20 世纪的第一位艺术大师——吴昌硕	87
返朴归真的齐白石	93
民国书法巨擘于右任	98
一代宗师徐悲鸿	103
独领风骚的画家张大千	108
玉京才人首领关汉卿	113

爱情剧圣手——白朴	118
名满梨园的马致远	125
以《西厢记》独领元曲风骚的王实甫	130
锦绣文章郑光祖	136
昆曲改革家魏良辅	140
明代传奇剧的开创者梁辰鱼	144
汤显祖与《牡丹亭》	151
剧坛奇葩《长生殿》的作者洪升	158
以《桃花扇》而饮誉海内的孔尚任	165
京剧鼻祖——程长庚	172
一代伶王谭鑫培	176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	182
战斗的京剧艺术家周信芳	187
戏曲改革的先驱田汉	194
艺坛楷模欧阳予倩	201
程派京剧艺术的奠基人——程砚秋	206

书圣王羲之

史书曾记载过一个“东床坦腹”的故事：约在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太尉郗鉴想在当时的王氏贵族中为女儿挑选未来的丈夫。于是便派门生到王家找王导商议，王导让门生到东厢房王家子弟中任意挑选。门生观察了众多王家子弟后回来禀报郗鉴说，王家的众多子弟都不错，但听说来挑选女婿，都穿得整整齐齐，表现文质彬彬，很讲究礼节，只有一个人躺在床上，袒露着肚子，不慌不忙地吃东西，如同未听说此事一样。郗鉴一听，立刻答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并前往观看此人，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位“东床坦腹”者，就是后来成为书圣的王羲之。郗鉴选择女婿的方式虽然颇有喜剧色彩，但他的眼力是不错的，挑选了一个最具有魏晋风度的名士。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人出生于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祖父王正，官尚书郎，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从父王敦，官太尉，从父王导，官司徒。童年时期的王羲之，口讷而不善言辞，到了青年时期，显出才华，受到了家族长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长大后能有一番作为。王羲之初入仕途，作秘书郎，与笔墨打交道，在笔情墨意中“游目骋怀”。到了而立之年，征西将军庾亮请他作参军，累迁长史，很受信任。庾亮临死前，还上疏朝廷，称羲之“清贫有贵裁”，建议重用。于是，王羲之便升迁宁远将军，并任江州刺史。王羲之以才名世，为政清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可他是一个内心很矛盾的人，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对政界的尔虞我诈非常厌恶，所以一次次推辞不就。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王羲之是个既有儒家传统、又有道家思想的人，所以入仕而不沉迷仕途，最后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

军”。他曾数次写信给扬州刺史殷浩，说“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内外和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人民才安居乐业。他还关心人民疾苦，“开仓赈贷”，“除其烦苛，省其赋役”，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才干。但他并不热衷于官场，而是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以及若干志投意合者一起畅叙表现了明显的兴趣。据《晋书》记载，年过半百的王羲之，经历了社会的动乱与为官的种种辛酸，有了摆脱世俗的强烈愿望。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从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山青水秀，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也居住在那里。当时，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知名的文人学士都在会稽建有别墅，他们与王羲之志同道合，经常宴集于会稽的兰亭。著名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在一次聚会时写出的。

在战火四起，相互残杀的年代，王羲之的政治道路是不顺利的。在他 53 岁任会稽内史时，一个叫王述的人做了他的顶头上司。王羲之在年轻时就看不起王述，而这时王述又借职权处处向王羲之发难，王羲之耻于在其部下供职，本来对仕途就不太热心的他，借机称病辞职，离开会稽郡，隐居金庭。临行前，他来到父母墓前发誓，决心不再从政。此后的几年里，他漫游各地，以山水流云为伴，以访仙问道而逸，以书法创作抒怀，直到 59 岁去逝。

王羲之虽然谢世较早，但因其杰出的书法艺术成就而永彪史册。王羲之 7 岁时开始学习书法，12 岁时看到父亲的床头有一篇书法理论著作《笔论》，便认真地阅读起来。父亲认为他读书法理论著作太早，但他却认为长大再读就太晚了，执意要读。于是父亲就讲给他听。羲之领略了写字的一些道理后，学书大有长进。父亲看他很有写字的兴趣，就把他送到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门下学习。王羲之后来曾自述其学书的经历：“余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至洛下见蔡邕石经，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学习书法从不满足的精神。

虽有家学，虽有老师的指点，但不是师法一家，而是博采历代书家之长，多方面继承传统。这是他在书法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之所以被后人称为书圣，主要是因为他在书法演变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羲之生活在一个由隶书转变到楷书的过渡时期，这时虽然楷书已经形成，但用笔和结构都比较粗疏，行、草书的行气还不够连贯。历史需要书法家对楷、行、草诸体进行完善和提高。王羲之不辜负历史重任，对前人的楷、行、草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融会古今的笔法，加以发展变化，开创了时代的新风格，形成了新的体貌。由于年代久远，王羲之的真迹今天一幅也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后人摹刻的作品仍可看到王羲之所创造的书法风貌。

传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多，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乐毅论》、《丧乱帖》、《孔侍中帖》、《奉橘帖》、《十七帖》、《姨母帖》、《袁生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黄庭经》、《兰亭序》、《长风帖》等。

《乐毅论》可作为王羲之小楷的代表作。是王羲之46岁时书写给儿子王献之的书法范本。内容为三国时夏侯玄所撰，论战国时代燕昭王乐毅攻打齐国取胜，反而被国王怀疑有野心，无奈只好离开燕国去赵国的故事。此帖字44行，书法开阖纵横，柔中寓刚，被后人称为最优秀的小楷。现在存世刻本有多种，以《秘阁本》、《赵州石氏本》最佳。虽然是小楷，与《黄庭经》、《曹娥碑》一样，写得雍容和雅，行笔自然。王羲之的楷书是师法钟繇的，但又有新的创造。钟繇的楷书笔画还未能摆脱隶书的意味，而王羲之则基本脱尽了隶意，属于较为地道的楷书了。王羲之的楷书寓潇洒于方正之中，现飘逸于工整之外，在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王羲之的草书以传世的《十七帖》为代表。该帖收王羲之的草书信札28通，107行，942字，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而得名。王羲之以前的草书，还未能很好地解决行气的问题，不

注意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气脉贯通。而王羲之的草书，将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气势处理得自然，笔画的起止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行书是东晋的主要书体，也是王羲之成功的主要书体。王羲之的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兰亭序》是王羲之在极为愉快的心情下用蚕茧纸、鼠须笔写出的。全文共28行，324字。通篇道美飘逸，字势纵横，变化无穷，如有神助，充分体现了行书起伏多变、节奏性强、形态多姿、点画相应的特点，在章法、结构、用笔上都达到了行书艺术的高峰。从章法上看，布局自然，采取纵有行、横无列、行款紧凑、首尾呼应的手法。28行的字距大致相等，偶有疏密。通篇的行距，前4行较疏，中幅较匀，末5行紧密。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不求划一，长短配合，错落有致，表现出行书随手书写的自然姿态，颇得自然潇洒之美。结构上灵活多变。《兰亭序》的结构可说极尽变化之能事，它不强求平正，强调欹侧，不求对称，强调揖让，不求均匀，强调对比。结体或修长或浑圆，突破了隶书扁平方正的形貌。特别是文中字有重复者，则转构别体，无一雷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十多个“之”字，写法个个不同，或平稳舒敞，或藏锋收敛，或端整如楷，或流利似草，变化不一，尽态极妍。用笔也变化多端。《兰亭序》的用笔，看似无法而方法具备。笔画的提顿导送、使转运行具有上下起伏的节奏感，给人以浑然天成的感觉。点画中以露锋入纸，凌空取逆势，而且取势快，笔意活泼生动，可谓笔画粗细并出而锋芒特见。以勾、挑、牵丝来加强点画间的呼应，使点画之间脉略相通，意气流动，其牵丝带络，揖让挪移，则又气脉贯穿，俯仰有情，增加了行书的波动性和呼应关系。线形多变，于不经意中，涤尽隶书逆入平出的笔意，可谓入古出新，戛戛独造。至于其他以欹侧代替平整，以圆转代替方折，用笔内挾，朝揖向背，敛收有致之法，无不精妙。通观《兰亭序》中的章法、结构、用笔，虽各自称雄，但互不侵夺，配合得非常默契。通幅作品显示出浓纤得体，圆润流畅，充分表现出晋人潇洒自然的风致，无愧于“天下第一行

书”的称号。

作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在书论方面也表现出自觉的探索。他论述书法强调“意”的表现。即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意绪的抒发表现。他曾指出：“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他认为书法要点画之间皆有一种言所不尽的深意，才能得其妙。这一点极精辟地概括了书法艺术的特征。

由于王羲之创造了新的书法风貌，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他在世时，其书法就得到了高度评价，许多青年人纷纷学习他的书法。就连当时的庾氏家族中的青年人也以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为荣，气得偏于保守的庾翼大为恼火地说：“儿辈厌家鸡而爱野鹜！”所谓家鸡，是指比较质朴的旧派书法，而所谓野鹜，则是对王羲之新体的蔑称。大凡一种新的艺术流派面世时，总会遭到守旧一派的反对。但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王羲之的新体符合书法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范本来学习。王羲之去世后，人们对王羲之的书法评价越来越高。到了唐代，经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推崇，王羲之登上了书圣的地位，他的书法也成为正统的书法。唐代以后，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南宋的皇帝赵构、元代的赵孟頫、清代的乾隆皇帝等有影响的书家都是王羲之书法的爱好者和提倡者。直到现代，沈尹默等著名书家仍然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证明王羲之的书法是站得住脚的，王羲之本人无愧于“书圣”的称号。

（李一）

“虎头三绝”顾恺之

世界各民族艺术都不外乎要经历一个由积累、形成到成熟、完美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空前绝后、集前人成就之大成的天才艺术大师对本民族艺术的形成、升华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极其辉煌和巨大的，他们的名字随着这门艺术的流传而流芳百世。后世的人们常将他们尊奉为该门艺术的祖师。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是这样。顾恺之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中国“画家四祖”之首的这样一位天才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绘画高度发展并形成基本绘画体系的时代。

强大的汉帝国在统一的文化背景下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并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雄朴为基调的艺术风格。汉末的动乱和三国鼎立，使各地域文化得以更普遍地交流，江南也发展成了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西晋短暂的统一紧接着北方战乱频繁与晋王朝南迁，使江南地区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古代所谓“六朝繁华”、“歌舞升平”之地。正统的中原文明在江南水乡的绮丽风光与富足资源中化成了一种柔美灵动的妩媚，甚至有一种醉生梦死般的狂放与洒脱。这时，文学艺术得到了格外的重视与发展，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都各自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顾恺之就出生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中。

顾恺之（约公元344—405年）字长康，小名虎头，出生于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顾毗曾在皇宫中任过散骑常侍的官职，侍奉于皇太子或皇帝跟前，以善于辞令而得赏识。他的父亲顾悦之历任无锡县令、别驾、尚书左丞等官职，也很有才能与相当高的文化素养。顾恺之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周围有着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加之当时

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更增加了在上层士人集团中重视游乐与讲究书画的风气。顾恺之幼年时代即显得十分聪慧，比及年长，更是博学精思、多才多艺，犹善绘画。传说他曾师承西晋时代著名画家卫协，而卫协又是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画家曹不兴的弟子。曹不兴的绘画在当时被赞誉为东吴八绝之一。传说吴国君主孙权在天旱时曾以曹不兴所画的龙图祈雨而获天降甘霖。当时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曹不兴善于吸收佛画的技巧，在当时也以善绘佛像而著称一方。卫协继承了曹不兴所长，更重视对中国传统绘画的重新创造。他把汉代以来中国绘画中那种构图模式化、用笔随意化的倾向改造成一种精致巧妙的风格。后来的美术批评家在评论卫协在绘画史上的成就时指出：“古画皆略，至协始精。”这是十分中肯的。顾恺之师从这样一位有影响有成就的大画家，加上他自己的天赋才学与勤奋努力，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晋哀帝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建康城（今江苏南京）里勅建的瓦官寺落成。当时佛教作为一种新兴的外来文化式样，不但受到各级统治阶级的重视，也引起了广大士人以及民众的注目，以至江南城镇里建寺成风。勅建寺院是指由皇帝下令专门修建的寺院，它的落成庆典当然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关注。寺院落成时，需给寺中供奉的佛像点睛，称之为“开光”，如同今天的落成剪彩一般，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庆典。为了给寺院敛财，瓦官寺的僧人们在寺院开光之前，向皇城中的达官贵人化缘，请求他们给寺院布施钱财。当时，城中笃信佛教、奉佛供僧成为一种时尚，何况是勅建寺院的落成，于是，施主们纷纷解囊，在化缘簿子上注明自己布施钱财的数目。经过一段时间，城中的施主们已经差不多找遍了，最高的捐钱数目，还没有一位超过十万的。这时，僧人们找到了正在建康城中闲居的、年方二十来岁的青年画家顾恺之头上。顾恺之二话没说，大笔一挥，在布施化缘簿上写下了“捐钱百万”的许诺。与京城中的达官贵人相比，一个县令的儿子、未曾入仕的青年人，当然是一个“穷小子”，而“百万钱”决不是